

## Robert Vannoy , 《申命记》, 第 9 讲

© 2011, Robert Vannoy博士、Perry Phillips 博士和 Ted Hildebrandt

“3”是“没有历史序言”。“4”是“缺乏基本规定”。请记住，在赫梯形式中，基本规定是忠诚的基本义务。它紧随序言之后出现。国王说：“这是我做的，所以你应该努力侍奉我，宗主。”亚述条约没有基本规定，因此这是第二个结构性差异。附庸国对主要伙伴的效忠声明紧随赫梯条约的历史序幕。当然，现在亚述条约中没有历史序言，因此也就没有这个基本规定。因此，亚述条约取而代之的是效忠宣誓。但你注意到这是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看看它里面装的是什么。它紧接着咒骂，后面还有更多的咒骂。因此，宣誓是在恐惧的背景下进行的，而不是在信任和忠诚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赫梯条约中，有历史序言，后面跟着基本规定：

“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件事；我已经为你做这件事了。”现在，在我为你所做的基础上，为我服务，对我忠诚。”因此，它再次强调了双方关系质量的差异。好吧，就是第四个，“缺乏基本规定”。

五是“无福”。还有另一个与亚述条约的严厉基调相一致的结构差异。没有列举出遵守条约规定的好处。赫梯条约有诅咒，也有祝福。亚述条约只有诅咒，没有祝福。祝福是赫梯条约中的永久规定之一。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说，当你比较两组条约时，它的缺席再次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不仅从结构的角度来看，而且从正在建立的关系的角度来看。

至于咒诅和祝福，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 20 章，十诫中只有一点点祝福和咒诅。你会在孝敬父母的命令中得到一丝祝福。“孝敬父母，才能在这片土地上长

寿。”这相当于：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受到祝福。“不可妄称主名；不可妄称主名；妄称他名的，主必不以他为无罪。”但祝福和诅咒元素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并不是每一条诫命都有，但我认为十诫中有咒诅和祝福的成分。申命记中的这一点当然更加清楚。

好吧，那是数字“5”。“6”是“亚述条约的规定是片面的”。亚述条约的规定仅针对次要伙伴或附庸。换句话说，小伙伴的义务是对大王的。没有暗示国王有义务供养和保护封臣的相互责任。这在赫梯条约中很常见。换句话说，在赫梯条约中，伟大的国王不仅说：“看，我要你做这个、这个、这个”，他还责成自己为附庸做某些事情。因此，那里存在着一种互惠关系，而亚述规定的片面性是不存在的。

7. “亚述条约是严格的继承条约。”亚述条约的主题与赫梯条约的主题截然不同。在亚述条约中，整个事情都针对一个特定的问题，那就是继承问题，即来自撒哈顿的亚述巴尼拔国王的继承问题。因此，当你将其与赫梯条约进行比较时，赫梯条约不仅仅局限于合作伙伴之间关系的某一方面。它们涵盖了协议双方都重要的广泛主题。

所以“8”就是“结论”。在我看来，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可以说亚述和以撒哈顿条约与赫梯条约之间存在重要差异。亚述条约的结构模式不同，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不同的精神。因此，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而是一种亚述国王对附庸国提出的严厉要求和威胁的关系。

现在，基于这些考虑，在我看来，梅雷迪思·克莱恩确实有合理的依据说亚述条约不同于早期的赫梯条约。在那段时间里，条约的形式发生了演变或变化。他有充分的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有趣的是，Mendenhall 在 1954 年撰写了那篇文章，呼吁人们关注条约和盟约材料，而 WF Albright 和 John Bright 等人在这一点上也同意克莱恩的观点。门登霍尔在他的原创文章《法律与盟约》中说：“作为研究以色列传统的起点，这种盟约类型更为重要，因为它无法证明它在伟大帝国的衰落中幸存下来。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当帝国再次兴起时，特别是亚述，他们约束其封臣的盟约结构完全不同了。”这是门登霍尔的声明。他说你无法证明最初的赫梯条约在亚述条约中延续到了下一个千年。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他进一步说道，“在所有其他材料中，我们都缺少亚述条约的历史序言。只有亚述诸神被列为见证人。整个格局也截然不同。当然，这种形式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幸存下来。但作者未能找到任何证据。我们还应该预料到，即使它确实幸存下来，或多或少，形式上也会发生深远的变化。”

《石器时代基督教》中的奥尔布赖特同意门登霍尔的观点，他说：“我们所知道的公元前八世纪末及以后的腓尼基条约中发现的六份亚述条约的结构是完全不同的。”这与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的《以色列史》相似。

因此，考虑到这些因素，我很困惑为什么 DJ 怀斯曼和麦卡锡说形式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出版亚述条约的怀斯曼和麦卡锡都认为，形式本质上是相同的。DJ 怀斯曼（DJ Wiseman）在其发表的条约评论中说：“条约的形式在赫梯帝国时代就

已经标准化，而这份文本（即以撒哈顿的附庸条约）表明它基本上保持不变。通过新亚述时代。”他谈到了标准化的赫梯形式，称其在亚述时代一直没有改变。然后麦卡锡拿起它，支持怀斯曼并说道：“据说第一个千年的亚述条约和其他条约在结构上与第二个千年的赫梯形式相对不同。在我看来，刚刚完成的分析未能证实这一点。”最近，摩西·温菲尔德（Moshe Weinfield）在他的著作《申命记和申命记学派》（*Deuteronomy and the Deuteronomistic School*, 1972）中说道：“没有理由认为赫梯条约的制定是独一无二的。门登霍尔关于只有赫梯条约才是圣经之约的模型和原型的假设没有任何依据。”现在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但你所拥有的是DJ怀斯曼、麦卡锡和温菲尔德，他们说亚述和赫梯条约基本上没有区别。而克莱恩、奥尔布赖特、布赖特、门登霍尔和其他人则认为赫梯形式和亚述形式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变化。现在有一些相似的元素，你有规定，你有诅咒，你有证人。确实，你们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在相似之处我的观点是，我认为门登霍尔的观点是存在一些显着的差异，这些差异具有足够的重要性，以至于人们不能说没有形式上的修改。

这种条约符合众所周知的亚述军事技术和战略，我们知道他们非常暴力和残酷。他们以恐怖的方式将自己强加于人，亚述条约的形式也符合这一点。

但温菲尔德和包括麦卡锡在内的其他几位人士所做的，是认为存在条约契约，并且其形式可以在《圣经》材料中找到，但它是在较晚的日期（大约公元前 600 或 700 年）从亚述人那里获取的，这绕过了马赛克起源的历史意义。我们不能

说以色列人从亚述人那里得到了条约形式；它并不像赫梯条约那样紧密地符合这种形式。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对于克莱恩的论证如此重要，但我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一点。

让我们继续D：“塞菲尔的阿拉姆条约与以撒哈顿的附庸条约以及赫梯宗主权条约的比较。”首先，一些介绍性的评论：有一些阿拉姆语条约称为“塞菲尔条约”。它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比亚述条约要早一些。亚述条约是公元前 672 年；Sefire条约是公元前 700 年八世纪的条约。它们通常简称为“Sefire 一”、“二”和“三”，因为存在三个条约文本。Sefire罗马数字 I、II 和 III。大约 60 年前，它们在一个叫叙利亚的地方Sefire被发现。但直到1958年它们才被发表并得到一些研究。其中两件现藏于叙利亚大马士革博物馆，另一件现藏于黎巴嫩贝鲁特博物馆。

2. “表格简要概述”——我在那里列出了表格的大纲。注意几个部分：标题；见证者诸神；诅咒，伴随着权利；条约的神圣性质；规定；对未来的提醒；祝福；咒骂。

现在，该形式取自第一个Sefire文本，罗马数字 I，这是一个完整的文本。其他的都比较零散。但你有一个介绍缔约方的头衔。它说：“维尔加亚人（在某个地方）与法尔法德国王上索马斯之子马蒂尔签订的条约。”这样就介绍了该条约的两个伙伴。现在，这是维尔加亚条约。除了对他的提及之外，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没有其他已知的参考。他所统治的土地也无法确定。附庸马蒂尔在亚述人的另一份

条约中得到了确认—亚述第五位统治者阿舍尔-米拉里的条约。马蒂尔是公元前 754 年左右幼发拉底河和地中海之间叙利亚北部的统治者

我不会详细介绍所有这些部分，我认为从标题中您可以看出它是什么类型的材料。但附带权利的诅咒将有这样的部分：“正如这蜡被火燃烧一样，阿尔帕德和她的女儿城市也将被烧毁。”所以听起来他们是通过燃烧蜡来展示诅咒的。

第二个Sefire文本非常零散。它被发现有大约十几块，当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时，你会看到一些描述看起来与这些文本的结构非常相似。但与其他条约相比，它的价值并不大。

第三份文件又是零碎的，只有规定。这是第三个文档中仅存的部分；这是表格中的第 6 部分。但它的规定是这三个文本中最广泛的。这样您就可以对规定有广泛的了解。它们涉及诸如交出阴谋者、交出逃犯、通行自由、越境、暗杀时的报复、逃犯的相互返还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事情。就其保留而言，这些规定是片面的。他们规范封臣的行为。它们不具有互惠性，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逃犯返还。所以有一个例外，但一般都是片面的。

让我们继续讨论第三点：“《塞菲尔条约》与《亚述条约》的相似之处。”如果你看一下结构，你会发现两者在没有历史序言的情况下有相似之处。亚述条约没有历史序言，塞菲尔条约也没有历史序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可以说《塞菲尔条约》比《赫梯条约》更接近于亚述条约。它们没有历史序言，也没有基本规定。

菲茨迈尔说：“有一个元素明显缺失，那就是历史序幕。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阿拉姆语条约中省略这一要素，它的缺失构成了阿拉姆语条约和赫梯条约之间的主要区别。这个要素是赫梯圣约概念的基础。它构成了赫梯宗主权条约的法律框架。赫梯宗主回顾其封臣及其前任的恩惠，以确定封臣的服务义务。事实上，无论是亚拉姆语还是亚述语，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圣约中都缺少这一要素。”鉴于怀斯曼的评论，这一限定似乎是必要的，即圣约的形式在整个新亚述时代基本保持不变。你看，我们又回到了争论的焦点。菲茨迈尔出版了塞菲尔的阿拉姆语铭文；就是这个卷。我们可以阅读文本和他的评论。

第二，不仅没有历史序言和基本规定，而且规定也是片面的。我已经说过，除了逃犯归还之外，其他都是片面的。这再次与赫梯条约形成鲜明对比。我之前在谈到亚述条约时会提到过这一点，这些条约也是片面的。你看，在赫梯条约中经常有所谓的“保护条款”，伟大的国王承诺保护封臣。FC芬沙姆说：“赫梯条约中最人道的规定之一就是承诺保护封臣免受敌人的侵害。这种保护可能是为了保卫首席伙伴的王国而承诺的，但对于封臣来说仍然是一次最鼓舞人心的经历。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敌人。在这种条件下，小王国可以在和平共处时繁荣发展。亚述条约或塞菲尔条约中没有保护条款。”

另一个区别是证人部分的位置。在这些Sefire条约中，在介绍性段落、标题或序言之后，众神被召唤为证人。注意赫梯条约中证人的位置。这是在规定之后而不是之前。因此，在这个Sefire中，与赫梯的形式相比，它更接近亚述的形式。亚

述形式在序言或标题之后有诸神作为见证人。尽管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些差异，但还是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在某些方面，《塞菲尔条约》比《亚述条约》更接近赫梯条约，首先你会看到，双方的神都被列为见证人。阿拉姆语条约中引用了伟大国王和诸侯的神。同样，在赫梯条约中，双方的神都是见证人：伟大国王和诸侯的神。但亚述条约仅提及亚述诸神。他们没有说出小伙伴的神明。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塞菲尔条约》更接近于赫梯条约而不是亚述条约。

第三，这些规定的主题比亚述条约更广泛。亚述条约只涉及继承问题。塞菲尔条约的范围要广泛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更接近于赫梯条约。

第四，菲茨迈尔在讨论《塞菲尔条约》时指出，其中一些条款的制定风格与赫梯条约制定的规定非常接近。有非常密切的对应关系，所以你也可以指出这一点。

这让我想到“5”“结论”。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塞菲尔条约》与早期的赫梯条约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同时也存在重要的差异。特别是缺乏历史序言、基本规定、基本规定的片面性。所以看起来你有进步。你有经典的赫梯形式，然后你有Sefire条约，然后是Esarhaddon亚述条约。与亚述语相比，Sefire与赫梯语形式的关系更为密切。可以说，《塞菲尔条约》的结构和内容介于两者之间。其中有些类似于亚述条约，有些类似于赫梯条约。但克莱恩所说的关于条约形式发展演变的说法确实是正确的。塞菲尔条约和亚述条约似乎更多地基于恐惧，而赫梯条约更多地基于信任和忠诚。由于这位伟大的国王为他所做的一切好



事，封臣有理由以忠诚来回应。

这些人中的许多人试图通过说两种类型的条约之间实际上没有太大区别来回避克莱恩模型的力量。如果你观察它们并观察其结构，克莱恩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经典的赫梯形式和后来的亚述或亚拉姆语Sefire形式之间存在真正的区别。我们确实有拉美西斯二世和赫梯统治者之间的平等条约，而且我们也有该条约的副本。由于埃及和赫梯有关系，摩西很可能了解这些类型的文献。

这让我想到“C”，“条约/盟约类比对申命记日期的影响”。在我看来，证据证明了这样的结论：赫梯条约可以说代表了条约的一种独特的早期形式，在后来的条约中没有重复，无论是埃撒哈顿条约还是塞菲尔条约。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赫梯条约中反映的不同精神，这种精神植根于封臣对宗主国或伟大国王的感激和尊重。亚述条约的结构不同，精神也完全不同。塞菲尔条约与赫梯条约有一些相似之处，甚至比亚述条约更相似，但它们也缺乏重要的历史序言和基本规定。因此，我认为克莱恩对于宗主权条约的文献形式的演变的论述是有充分理由的。他承认这种差异不应该被夸大，这确实是旧约时代你所遇到的一个物种。但他确实发现了明显的演变。然后他说：“《申命记》在结构和精神上更符合早期赫梯条约，而不是八世纪和七世纪的塞菲尔条约或亚述条约。”我认为克莱恩的结论有很多优点，值得关注，尤其是一些批评学者所接受的关注。

克莱恩在他的《*大王条约*》第 43 页中总结道：“虽然有必要承认早期条约和后来条约之间实质上的连续性，但将公元前二千年的赫梯条约区分为经典形式是

适当的。毫无疑问，《申命记》属于这一纪录片演变的经典阶段。由此可见，

《申命记》的 *马赛克* 起源是伟大国王的条约。”这就是他论文的精髓。我认为他的结论是有道理的。

现在，为了更进一步，您正在阅读 J. Thompson 的《廷代尔评论》。他在第 51 和 52 页上表示，他对克莱恩论点的强度持保留态度。当你阅读汤普森的著作时，你会发现他主张《申命记》的日期是在公元前 11<sup>世纪</sup>和 10<sup>世纪</sup>，大致是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的联合君主国时期。它是后马赛克时代，但就国度而言是早期的。他认为摩西是这本书的核心，但他认为编辑过程使它变成了现在的形式，这是在摩西时代之后的。换句话说，他不接受克莱恩的论点，即这种形式支持申命记起源的 *马赛克* 日期。

他针对克莱恩的论点提出了这一点：“申命记是在摩西时代很久之后由某人以条约形式写成的。”换句话说，他并不否认条约/盟约的类比，但表示这种形式本来可以稍后采用。他的观点与 R. Frankena 的观点非常相似。弗兰肯纳在他的《以撒哈顿诸侯条约和申命记的年代》中审视了亚述条约，并主张希伯来人依赖亚述条约，特别是与申命记相关的诅咒表述。他说，“它们与亚述条约的形式密切相关”，因此他现在将它们与这个时代联系起来。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温菲尔德谈到希西家和约西亚时代的宫廷文士熟悉亚述条约形式并将其带入以色列。因此，从该机制来看，它与《申命记》一起使用。因此，汤普森评论说，“必须承认申命记是由摩西时代很久之后的某个人以古代条约

的形式铸造的可能性。”所以这是他说的一件事。

他说的另一件事是，“历史序言的论点并不合理，因为亚述或阿拉姆条约可能要么有序言，要么可能是口头陈述的。”他并不否认它不存在，但它说他们可能已经假设它或口头陈述它，因此它不在文本中。因此，你不能充分利用它没有历史序言。此外，他还声称有一份带有历史序言的七世纪条约文本的证据。问题在于它是一个有争议的文本；这是一篇非常支离破碎的文本，我们研究了那些对是否有历史序言存在争议的人。但无论如何，汤普森试图通过暗示历史序言并不是早期赫梯条约的独特特征来削弱条约形式演变的理由。因此他得出结论，“因此，《申命记》有历史介绍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是第二个千年的日期的论据，尽管它可能如此，”所以他在那里进行了对冲。

我想我的时间快到了。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但我想与汤普森互动，不仅仅是这两个论点，即历史序言论点和后来有人将其写入条约形式的想法。我将对此发表评论，然后是其他一些论点，但我们必须在下周初讨论崇拜的集中化之前这样做。我认为与汤普森互动很重要，因为汤普森的评论是在校际廷代尔系列中，这是一个福音派系列。我们可能期望汤普森会支持马赛克日期并接受克莱恩的论点，但他没有。

由阿莱西奥·特兰切尔转录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最终编辑：Perry Phillips 博士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重述